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台灣是一個典型的移民社會。這些移民隨著時間的遞嬗，在此土地上形塑出一種獨有的多元文化。若詳加審視此種多元文化，則可發現其之形成，乃是奠基於三種文化傳統上：原住民文化傳統、漢文化傳統和外來文化傳統。其中，漢文化傳統向為地理學者研究與論述的焦點，包含此文化展現在地表的聚落景觀¹，展現在人群的宗族組織²及展現在土地上的宗教景觀³。而透過該類研究，吾人可歸納出目前台灣地理學界，在漢文化地理中的二個研究趨向：首先，其研究對象幾以閩南民系與閩西粵東民系(客家人)為主。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於台灣所轄領土中仍有一族群，其文化雖屬漢傳統，但卻很少被論及與關注，此，即是馬祖地區的閩東民系。是故，本文冀望能透過此閩東民系之地理研究，藉以聲明並突顯其存在於台灣之事實。其次，上述漢文化地理研究多著重於景觀的物質層面、社會層面之分析，或藉由宗教景觀詮釋聚落空間性的象徵意義，然卻甚忽略人類主體在人地互動關係中所扮演的積極性角色。易言之，即上述台灣地理學界之漢文化研究，鮮見以人類識覺的觀點探討景觀層面，尤其是目前存於世之具體景觀，如何反映一個漢文化傳承的移民個體和群體，其早期如何觀察、識覺環境？實值得深究。

然而，以馬祖為研究區，必然牽涉到其特殊的歷史發展背景：其一，乃是因此地所處位置，在歷史發展脈落下一一直是所謂的「邊區」~自早期閩東沿海邊區，到後來納為台灣的邊區；其二，馬祖成為台灣的邊區後，自民國四十五年至八十一年實施戰地政務，期間一切事物皆納入軍管。在第一項背景中，尤其是馬祖地區長久處於閩東沿海邊區，除了早期常為倭寇和海盜嘯聚外，自清道光中國開放五口通商，東南沿海乃至馬祖地區，常有英人等西方人士活躍，而此類西方人在識覺馬祖地區後產生了何種景觀？且該類景觀有何特徵？再者，在第二項背景影響之下，由於軍政體制的介入，對該區早期居民識覺後所產生的景觀造成了何種改變？又此改變，背後蘊含的意義為何？上述問題，皆須納入本文加以檢視。

簡言之，本文擬以環境識覺的觀點，進行馬祖地區文化景觀層面之探究。而此項欲探究之景觀須有一前提條件，亦即，可反映人類對環境的識覺情形，因此，該景觀亦可視為是研究環境識覺的指標。此指標為何？本文將由下列相關文獻探討加以釐清。

¹如潘朝陽(1979)，《後龍溪谷地村落民房的形態》、王嘉麗(1980)，《竹東鎮民房的地理研究》。

²如廖秋娥(1989)，《觀音鄉閩客村落的宗族組織與生活方式》、李錫祥(1997)，《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

³如朱毓慧(1997)，《公館平原祠廟之空間配置及景觀內涵》，鄭雅清(1997)，《新埤庄的空間性——以宗教景觀和祭祀活動為例的詮釋》。

第二節 文獻探討

為解決上述問題，本文擬從地理學人地傳統中的環境識覺研究文獻著手，藉由國內外相關研究，整理、分析出可行之研究指標和研究概念。

(一) 國內外環境識覺研究之對照

一般而言，行為地理學的內涵有兩部份：環境識覺(environmental perception)和空間行為(spatial behavior)。探討此一入地傳統的方法論亦有二：實證方法論與人本主義、現象學觀點之方法論。而本文研究立場，雖以環境識覺內涵、實證研究方法論為主軸，但學術上仍有許多跨主題之整合研究或能給予本文相關之思維啟迪，據此，下文乃以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進行對照探討，藉以歸納出可能採用之研究概念和指標。

環境識覺雖是人地傳統中較新的研究主題，但近年來確實吸引不少地理學者深入鑽研。若依其較常見之研究主題，概可分為以下三類：

1. 災害識覺

災害識覺研究最主要的推動者，可追溯到美國芝加哥大學 Gilbert White 早期進行的人類對於洪患調適之研究。爾後，Burton 和 Kates 等人亦搭上此洪患研究列車。其中 Kates(1967)⁴，更將研究視野由河流洪患延伸至海岸洪患，探討位於美國東北大城市沿海居民對於暴風雨所造成的災害識覺程度。此外，除了洪患，其他自然災害的研究也漸被注意，特別是 Saarinen(1966)⁵首先關注美國大平原上麥農對於乾旱災害的識覺與調適問題。隨後，其他類型的自然災害識覺研究如地震、火山、颶風等，紛紛繼起，甚至到 1980 年代後，有轉向人類科技所引起之污染災害的識覺研究趨勢傾向。

簡單回顧國外研究概況後，反觀台灣地理界之研究。台灣的災害識覺研究最早由張長義(1977)提出，其後相關課題之研究多如過江之鯽。許心寶(1985)⁶以單一災害為切入點，探討濁水溪下游南岸農民對於風災的識覺與調適行為。而與許氏同樣探討較大區域之識覺課題，楊雲龍(1995)⁷卻從多種災害的分析角度著手，以究明資源使用者與資源管理者之災害識覺與調適行為，並進一步分析兩者對防災政策之反應與其間之差異。

以上針對國內外災害識覺之研究回顧，雖不甚完整，但仍可整理出二點與本研究相關之思考方向。首先，所謂的災害識覺，乃指災害資訊經由各種管道為個體所接收，再經過價值系統過濾後而成為意象，該意象並成為個體調適回應過程

⁴ Robert kates(1967),The Perception of Storm Hazard on the Shores of Megalopolis', in D.Lowenthal,ed.,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nd Behaviour,Research Paper 109,Chicago: Department of Geogra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⁵ Thomas Saarinen(1966),Perception of the Drought Hazard on the Great Plains, Research Paper 106,Chicago:Department of Geogra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⁶ 許心寶(1985)，《濁水溪下游南岸農民對風災識覺及環境調適之研究》、師大地理所碩論

⁷ 楊雲龍(1995)，《蘭陽平原環境災害識覺之研究》、台大地理所博論

的參考。(楊雲龍, 1995 : 3)然而, 其中災害資訊之識覺, 多與極端事件相關, 無法全面呈現居民對其生存環境的認知情形。另一方面, 災害識覺研究的重點除了探討人類對災害的調適外, 還包括此調適行動的依據~意象, 而此類研究在進行意象之度量時, 皆以問卷方法為基礎。

2. 空間識覺

關於空間識覺, 早期的經典代表作非 Lynch(1960)⁸的 *The image of the city* 莫屬。Lynch 可稱的上是第一位以經驗形式檢驗環境意象的學者, (Bunting, 1979 : 449), 其以波士頓、澤西市和洛杉磯三城市之居民為研究對象, 透過訪談與居民之心智圖繪製, 歸納出城市意象的五項視覺元素: 路徑、節點、邊緣、地區和地標。Lynch 具開創性的意象研究, 不僅帶動往後各國都市規劃研究的蓬勃發展, 亦為地理學界之識覺研究注入了實證操作方法上的靈感。

除了都市識覺研究外, 景觀(地景)識覺亦是空間識覺中一個龐大的次領域。該類研究在地理學界是由主觀性的論述作為出發點, Lewis(1962)⁹以歷史記述闡明不同族群(法、英和西班牙)在相同環境(北美大平原)下傾向描述令其印象最深刻之特徵。而比 Lewis 更強調人對景觀的態度, Lowenthal(1965)¹⁰則置焦於英國人對英國景觀的偏好觀點。然而此類景觀經驗的歷史描述性研究, 之後並無引起多大共鳴, 反而是以風景特質觀點為主的客觀性景觀評估研究, 在 1970 年代後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該類早期研究, 多著重於研究者選定之風景相片以進行研究對象之偏好情形調查, 其後, Mosley(1989)¹¹以紐西蘭河流景觀之彩色幻燈片與問卷, 對政府機構員工及社會成員調查其景觀之偏好程度。而不同於以往只關注於視覺及由研究者選定識覺材料之觀點, Dakin(2003)¹²以更廣的景觀識覺角度~居民對景觀經驗的文字敘述, 伴隨著居民主體攝影所拍攝的照片, 來分析並闡釋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 Cariboo 地區居民的景觀識覺。

台灣地理學界在空間識覺上之研究亦有些成果。徐君臨(1989)¹³透過漁民對漁場的命名、區分和位置的辨認, 及時間地理學的概念, 說明台東豐濱磯崎、石梯二處之漁民的空間認知和漁撈行為。同樣以漁民為研究對象, 薛雅惠(1991)¹⁴乃以現象學的觀點呈現高雄縣茄定鄉漁民對環境的認知與其空間行為。另外, 陳

⁸ Kevin Lynch(1960),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 I. T. Press.

⁹ G. M. Lewis(1962), *Changing emphases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American Great Plains area*, *Trans. Inst. Br. Geogr.* 30 : 75-90.

¹⁰ David Lowenthal(1965), "English Landscape Tastes", *Geographical Review*, 55 : 186-222.

¹¹ M. P. Mosley(1989), "Perception of New Zealand River Scenery", *New Zealand Geographer*, 45(1) : 2-13.

¹² Susan Dakin (2003), "There's more to landscape than meets the eye: towards inclusive landscape assessment i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 Canadian Geographer*, 47(2) : 185-200.

¹³ 徐君臨(1989), 《台灣東部漁民漁場空間認知與漁撈活動之研究》、台大地理所碩論。

¹⁴ 薛雅惠(1991), 《高雄縣茄定鄉漁民生活世界的探究》、師大地理所碩論。

鳳儀(1999)¹⁵則以學童為對象，調查其對基隆港已內化的心智圖意象，並提供作為鄉土教材之參考。

藉由上述國內外空間識覺之研究，我們可獲得一些啟發：其一，在處理「識覺」之課題上，多以研究意象為主。而在探討及研究意象之過程中，可見到兩種方法論的應用：包含實證方法取向(問卷、心智圖、照片)及人本主義、現象學較為質性之方法取向(深度訪談、參與觀察和經驗描述)。其二，國內研究在探討空間識覺問題時，甚少直接強調文化因素在人類識覺環境上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期能彌補此一闕漏。

3. 遊憩研究

遊憩研究自 1970 年代以來一直是行為地理學中盛行不衰的研究主題。而近來西方學界之研究如：Jutla(2000)¹⁶以照片攝影、展示和問卷方式，調查印度西姆拉之遊客和居民對該城市之意象。Tosun(2002)¹⁷則以問卷調查，輔以個別訪談，針對土耳其 Urgup 之居民，研究其對觀光發展之衝擊識覺情形。

台灣地理學界在此課題上之研究成果亦頗豐碩。林遠航(1992)¹⁸以主體攝影法分析遊客對擎天崗之景觀認知。倪進誠(2000)¹⁹乃以問卷調查和參與觀察研究遊客對澎湖之環境意象、旅遊決策和旅遊行為。而李政修(2003)²⁰採取不同於前二者之觀點，其以當地居民之立場出發，研究復興鄉華陵村居民對觀光發展所帶來之衝擊的識覺情形。

透過上述簡略之遊憩識覺研究探討，可歸納出二點與本研究相關之思維：第一，遊憩識覺研究的重點，除了部份處理到遊憩行為外，所有研究必定論及識覺意象之探討，且其量度方法多以問卷調查和照片攝影為主。其次，遊憩識覺和前述災害識覺、空間識覺之不同點，在於其除了以「居住者」之角度論其識覺外，更關注於「外來者」-即遊客對一地之識覺。據此，當我們在研究環境識覺時，特別是針對某一地區或環境，若能從兩個角度併行切入探討，相信應會有不同於往昔之研究成果展現。

4. 綜合分析

最後，經由國內外較常見之識覺研究主題的文獻對照探討，可再做進一步綜合分析。無論是災害識覺、空間識覺或遊憩研究，亦無論此三種研究有無論及或牽涉到空間行為，其共同目的，皆在於探求人對於環境之識覺後，在腦海中所呈現的「意象」，此亦即為人類後來是否有決策和外顯行為出現的依據。由此可知，

¹⁵ 陳鳳儀(1999)，《基隆港環境意象研究-學童個案之探討》、台大地理所碩論。

¹⁶ Rajinder Jutla(2000)，" Visual image of the city:tourists' versus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Simla,a hill station in northern India " ,Tourism Geographies , 2(4) : 404-420.

¹⁷ Cevat Tosun(2002)，" Host Perception of Impacts- A Comparative Tourism Study "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 29(1) : 231-253.

¹⁸ 林遠航(1992)，《遊客對擎天崗之環境知覺研究》、文化大學地理所碩論。

¹⁹ 倪進誠(2000)，《外在作用力形塑下觀光空間的遊客行為之研究-以澎湖群島為例》、台大地理所博論。

²⁰ 李政修(2003)，《復興鄉華陵村居民觀光衝擊識覺之研究》、台大地理所碩論

行為地理學的研究根基乃是奠定在意象的探究上。此亦將為本文研究核心。

然而，正如 Grossman(1977)所言，環境識覺雖是一個有前景的研究領域，但仍遭遇到一些瓶頸，一方面，是源於對識覺、價值、態度和實際行為之間複雜關係的了解；另一方面，乃是如何度量無形的識覺和態度問題。(Grossman,1977:140)特別是後者的研究，即意象之度量，乃是解決前者問題的先決條件，更須加以檢視。而藉由前述識覺研究文獻探討，不難發現目前國內外地理學界在研究意象時，應用的方法可分兩種取向：一種是實證方法，利用問卷調查、心智圖繪製、照片測試等，該類方法亦可視為是研究意象的具體指標；另一種則是具有現象學、人本主義色彩之質性研究方法，包括深度訪談、參與觀察或歷史經驗重建之描述。

以本文置焦之第一種實證取向方法而言，三種偵測意象的具體指標(方法)只能針對目前存於世之受訪者實施，無法探求早期人類識覺之腦海意象。再者，Bunting(1979)認為問卷調查雖廣為被採用，但仍有其令人質疑之處：首先，心理學者的問卷調查是在部分控因限定下所實施，而地理學者若採用相似的方法，將無法反應地理學科本質的複雜性；其次，是關於由問卷調查所得之意象是否真能顯示個體之實際思想的懷疑。尤其是問卷所列選項能否顧及個體之社經、政治背景，將是導致所探求之意象是否遭受扭曲的主因。(Bunting & Guelke,1979:453)因此，以問卷調查受訪者意象，確實存在著一些棘手的問題。另外，心智圖的採用，就 Bunting (1979)的看法，主要聚焦於地方偏好的研究上(Bunting & Guelke,1979:451)，而且由某些實證研究²¹顯示，並非所有地區皆適合使用此研究方法。最後，關於照片的測試，由之前的文獻探討可知，其多應用在風景審美的識覺研究，此與本文研究主題較不切合，因此亦不予以採用。綜上所述，目前環境識覺研究所利用之研究指標(方法)，皆不適用於本文，那麼，本研究將何所依從？地理學者 Wood(1969)曾指出，源於心智的態度、意見和印象雖不能直接觀察，但可藉由口語和書寫之文字作為媒介以進行研究²²。(Wood,1969:136)據此進一步思考，目前現存於世之具體文化景觀中，何者最能代表早期居民經由口語和文字流傳所反映出來的環境識覺意象？地名景觀，似正契合於前述條件。本研究繼之乃針對國內外相關地名研究進行探討，除藉以解釋地名為何得以作為研究環境識覺意象之具體指標外，並獲得研究方法上之啟發與靈感。

(二)地名研究之文獻探討

台灣地名研究，曾有多位學者投注心力於其上。其中，首開台灣地名系統性研究之先河者，當屬伊能嘉矩(1909)。伊能氏在其所撰之《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台灣》中，除了佐以台灣各種開發史料詳細闡明台灣各個堡里鄉澳及其內屬

²¹如 Rajinder Jutla 在印度 Simla 地區的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訪者不會或無法完成繪圖，甚至某些受訪者更拒絕繪圖，參閱註 16,P409。

²² Gollledge 和 Stimson(1987)亦提出類似看法。其認為，為呈現人類之環境意象，許多學者採用了受訪者書寫文字、口語和圖片式的調查報告，作為之後觀察人類行為的推論結果。(Gollledge 和 Stimson,1987:54)

之重要小地名由來外，更值得本文關注的是，其所提出之台灣地名命名通則。伊能氏認為，台灣地名之所以有多樣變遷，係因本區自古以來歷經複雜之住民予以命名的結果。雖然追溯該類地名由來已困難重重，但仍可歸納出其命名之基本通則。此通則除了包括因諧音訛傳、增添、合併或省略字、及為求雅化等因素所造成的地名轉化外，更重要的是台灣地區一般地名命名的九項原則。該九項原則條列如下：

1. 以自然事物之形勢位置作為地名命名之依據：如崁腳、後埔、林仔邊等。
2. 形容自然事物之特殊地勢作為地名命名之依據：如枕頭山、雞心嶼等。
3. 以某地存在之特殊天然產物作為地名命名之依據：如龍眼林、礮山等。
4. 以某地存在之山河勝蹟或建造物作為地名命名之依據：如枕頭山庄、關帝廟等。
5. 以某地之歷史沿革或古老傳說作為地名命名之依據：如吳全城、阿公店。
6. 以某地拓殖或建置當時之情形作為地名命名之依據：如三張犁、八塊厝。
7. 於某地拓殖或建置當時，擇吉言佳字為地名命名之依據：如彰化。
8. 以移民原鄉地名作為地方命名之依據：如東石港、芝山岩。
9. 因歷史動機所改易之地名：如嘉義。(伊能嘉矩,1909:5~8)

其中的第一~四項，實為住民生活場域之環境特色反映。然該特色之呈現，如地形方位、地形形態和主要優勢物產與顯著之勝蹟、建物，乃是住民識覺於該地，基於其環境特徵與住民本身所持有之知識或價值觀交互組織結構後，所命名之果。由此不難看出，地名景觀，乃為人地互動後的一項具體有力證據。

除了伊能嘉矩，專注於台灣地名研究之日本學者另有安倍明義。其所編著之《台灣地名研究》，主要以前述伊能氏之著作為藍本。在地名由來之闡述內容上，與伊能氏相較，安倍氏在重要的地名條目下加列一些重要小地名，此外，其地名釋義內容在深度與廣度上皆不如伊能氏。另一方面，安倍氏亦列出台灣地名命名通則，然其所述，幾源於伊能氏之言，惟在其所舉之命名通則實例中，額外針對該類地名之通名，如崙、潭等，加以闡釋，此特點或予以後輩一些著述上之啟迪作用。

陳正祥(1982)對地名研究的切入點不同於前兩學者，其以五萬分之一地形圖上所呈現之地名為論述基礎。在陳氏所著之《台灣的地名-文化層分期》中，得出兩項重要研究成果。其一，陳氏認為地名的來源與演變除受天然環境影響外，更有如地質或古生物學之化石一般，具有不同歷史時期之文化層指標作用。(陳正祥,1982:214)其二，作者認為台灣的地名分類，可歸納為地形、方位、示意、紀念、聚落、特產和複合地名等七類。而此等分類實則反映前述第一項觀點，即地名乃由當地地理環境與不同時期住民之文化特徵緊密交織所組構之產物。

洪敏麟(1984)在其著作《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中所撰述的台灣地名緣起，突破上述學者所具有之部分傳統。洪氏首先將台灣地名分為兩大類：起源於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地名。前者，除了傳統上的地形、天然動植物之分類外，另增添位置、地點與氣候的分類觀點；後者，除了在地緣、交替聚落、土著

族社名與外來語譯音、異族稱呼、歷史或個人事蹟稱謂、建築物和墾殖的舊有分類上再加入新的通名或地名條目，如墾殖類別中又細分了起源於租館(公館)、水圳和農具倉儲等項之地名起源外；另一方面，亦開創新的地名類別項：血緣、商業或手藝業和交通等。據此，若不考慮資料來源的可信度，洪氏可謂為是自伊能嘉矩以來，於地名命名通則之建立上，既能堅守傳統優點，又可開創新局的地名研究學者。以本研究之立場觀點而言，洪氏的地名命名通則所給予的啟發如下：

1.以地形的命名通則為例

以地名通名部觀之。台灣式海岸是一種大尺度地形，但人類生活於此，為確認生活資源所在處與辨別方位，因而在該類海岸水深入且三面繞山處稱「澳」、將整個山地特別突出處稱「海岬」或「鼻」，甚正更將「海岬」之端稱為「角」。據此，藉由微尺度地名命名之區別，滿足了人類在環境上生存並與他人溝通的需求。再由地名之專名部而言。早期居民創建聚落的地點，多以對某種地形的關係位置作為其命名依據，如北埔、南崁等。如果創建聚落之地點有一個以上之同類地形，常於地形前冠上數字以為地名，如二重溪、三條崙。甚至，為區別聚落，而以地形之規模大小而命名，如大粗坑、小粗坑。(洪敏麟，1984:79-86)上述中的地形相對位置、地形數目和地形規模大小，以及台灣式海岸中的「澳」、「鼻」和「角」，皆為人類識覺環境中，對環境現象的一種辨別。西方學者 K.Lynch 認為，環境意象的內涵，主要由三個要素所構成：自明性(Identity)、結構(Structure)和意義(meaning)。一個可運作的意象首先需要辨認物體，即能「祐0出與他物之差異和知曉其本身為一可區別的實體。第二，意象必須涵括與觀察者和其他物體有關聯的物體空間或類型關係。最後，物體對觀察者須具有一些意義。(Lynch,1960:6-8)據此，人類於地形地名中的命名，實已具備了學者 Lynch 所界定之環境意象的三項要素，換言之，地名景觀為人類識覺環境的意象反映，已無庸置疑。

2.以自然環境之地名命名為例

地形地名，如地面上起伏突出者稱為山，低窪地則謂為窟，經常是感官識覺中由視覺所主導之命名。而洪氏關於氣候地名的分類，則暗喻了視覺以外的感受。如恆春，是居民對於當地地理環境中的氣溫識覺反映；風櫃尾、風吹沙，則是因冬季東北季風風力強勁所帶來的現象而加以命名，兼具視覺、觸覺甚至是聽覺的反映。甚至，洪氏在天然動植物中之動物種類地名，提及鹿鳴坑、龜吼二例，亦是基於人類聽覺感受命名的例證。故，地名不僅是人類識覺環境之意象表徵，與其他偵測人類意象的具體指標相較，其不但比問卷更具體而客觀，所涵蓋的感官識覺層面，又較心智圖與照片之視覺意象來的廣。

與上述學者強調之觀點相異，陳國章(1995)認為地名研究除了應採用歷史學方法外，更應運用語言學和地理學方法以進行深究。陳氏在台灣地名研究上最大的貢獻，在於以語言學觀點，探求閩客族群間同義而不同字之地名所呈現的地理意義。其中所謂的不同字，追根究底，乃源於該二族群之語言差異。如同樣對一茂生竹子的盆狀地進行命名，閩人稱之為「竹子湖」，而客人則稱為「竹窩子」。

(陳國章, 1995:18)藉由此兩族群之地名對比研究, 不僅可呈現其命名規律, 更能揭露兩者存在之區域差異性。然若從環境識覺的角度而論, 面對類似的環境, 不同的群族在識覺後加以命名而形成了迥異的地名景觀, 此現象提醒我們, 識覺意象的特點, 除了反映一地的環境特徵, 更深受識覺於該環境之人類主體所影響, 特別是其本身所具有的語言文化背景。

相對於陳國章以語言讀音的實證研究, 由施添福與陳國川共同主持之臺灣地名辭書, 乃以田野調查為主, 文獻史料為輔之方式進行研究。該系列研究成果中, 陳國川(1996)在其所著之《台灣地名辭書 卷十八 新竹市》²³一文, 將新竹市轄區實證所得之地名予以分類, 不僅反映出各區環境特徵之差異, 自然環境的單純或複雜, 對起源於人文活動之地名比例更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影響。易言之, 人類對環境之命名, 傾向以顯著之代表現象為依據, 此正與人類感官識覺特性相符。是故, 地名為人類識覺產物, 亦已不證自明。再者, 與前述地名學者相較, 陳氏在分類所採用之維生方式類項, 較能突顯人對地表環境之識覺敏銳程度, 本文亦將採用之。

地理學者 S.C.Jett(1997)在美國亞利桑那州 Chelly 峽谷區對當地 Navajo 族群命名的地名曾深入探究。如同前述台灣地名研究, Jett 所專注之焦點包含了文化、歷史和語言層面, 然除此外, 其更嘗試了一種嶄新的地名研究觀點, 即, 由環境識覺的角度切入。Jett 藉由被 Navajo 命名的對象特徵之頻率, 不僅反映出當地環境特色, 更呈現出當地 Navajo 住民識覺於該環境中認為最重要、最有意義的部分。因此, 雖然 Jett 並無將其研究成果與人地傳統的環境識覺理論概念作進一步連結, 但全文已瀰漫此種思潮。

綜觀上述國內外地名研究, 可知地名主要是由居住於該地之居民使用其母語而命名者, (陳國章, 1995:增訂版序) 其不僅可反映一族群之歷史與環境的密切關係, 更能傳達出人類如何識覺和利用環境的訊息。(Jett, 1997: 481)據此, 本研究擬以地名景觀作為研究環境識覺意象之具體指標。另一方面, 在地名研究上, 無論是中外學者, 幾以分類方法為手段, 此亦為本文提供一條探索途徑。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目的

經由上述文獻回顧, 我們整理出識覺研究之重要研究概念及確認欲採用之研究指標。以下除將針對此兩部分做進一步的解釋與界定外, 並探討兩者之間的連結分析方法。最後, 關於研究資料來源及研究目的亦將加以說明。

(一)研究方法

1.研究概念

透過目前地理學者之環境識覺實證研究探討, 可明確歸納出一個極為基本且重要的研究面向或概念, 即意象(Image)。意象的形成, 一般而言可分兩階段(見圖 1-1)。首先, 個體經由感官的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和味覺對外在世界訊息

²³該文撰文體裁不落前人藩籬, 地理思維盡呈於文, 堪為此系列研究作品中的經典之作。

(刺激)加以吸收，此過程稱為識覺(perception)。其次，識覺後的訊息經過腦部的過濾，再和個體所持有之知識與價值觀念組織後，即產生心智意象，該過程則稱為認知(cognition)。心理學家對於此兩種過程很審慎的做區別，但許多非心理學家有時則使用「識覺」來涵括兩者。(Haynes, 1980:2)。本文擬以識覺一詞作為意象形成之代表用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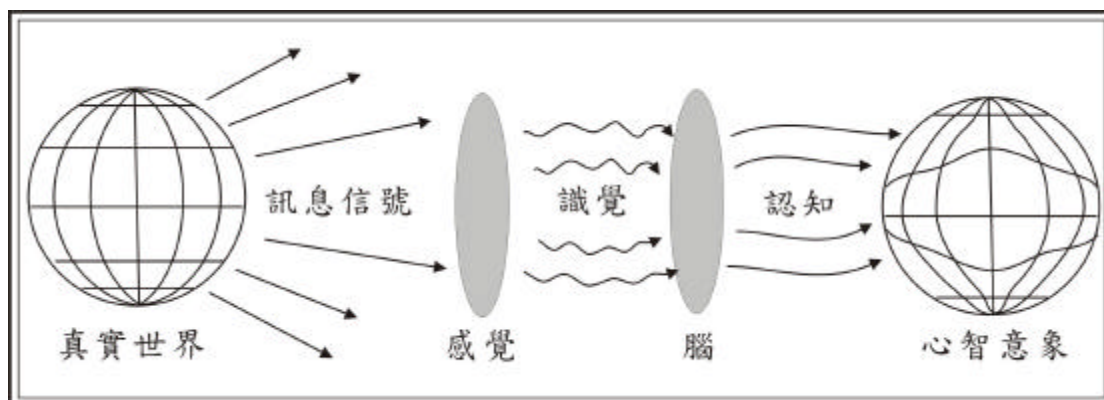


圖 1-1 意象的形成

資料來源：R.M.Haynes(1981)：p2

藉由上述說明，意象可簡言為人類識覺環境後的產物。然而，其之形成，除前述之外在世界、感官的訊息接收、腦部的過濾外，還受到其他因素影響。再者，外在世界為一客觀的真實世界，其與人類所識覺的主觀環境並不一致。基於此，本文以下針對意象相關的兩個研究層面~意象的形成與意象形成之環境分類，分別以地理學者之理論研究加以探討，藉以釐清可運用之研究概念：

(1)意象的形成(環境識覺)

探究意象形成(環境識覺)的地理學研究，概可追溯到 1947 年美國地理學者 J.K.Wright 的著作²⁴。Wright 建議地理學者不妨由想像(Imagination)去探索在地理課題上，存於個人腦海中未知的空間領域(terrae incognitae)；甚至，他更進一步提出所謂的地理知識論(Geosophy)：即以任何或所有的觀點而進行的地理知識研究。此亦即，地理學除應涉及過去和現在之地理知識研究，探求其真實與虛幻的部分外，更應納入除地理學者以外，源自各階層人物對生活環境主觀的看法~包括農夫、漁夫、企業經理、詩人、小說家和畫家等。

D. Lowenthal 的經典論文²⁵除了延續 Wright 的想像思維主軸外，其最具突破性的一點，是將外在世界和呈現在個人腦海中的意象(image)作較明確而深入的詮釋。該文最重要的結論是，對於世界的每一個意象和觀念，皆是個人的經驗、學習、想像和記憶所構成的化合物。易言之，個人識覺於環境所產生的意象，是

²⁴ Wright, J.K.(1947), "Terra Incognitae: The Place of the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 A.A.A.G, 27(1): 1-15.

²⁵ Lowenthal, D.(1961), "Geography, Experience, and Imagination: Towards a Geographic Epistemology", A.A.A.G, 51(3): P241-260.

透過上述四項過程交織形塑而成的。

R.M.Downs(1970)²⁶是最早發展出環境識覺觀念架構 (見圖 1-2)的地理學者。在此架構中，真實世界為一起始點，作為人類資訊的提供者。資訊經由人體之感覺器官接收後，再透過個人的價值系統過濾而產生意義，該意義被併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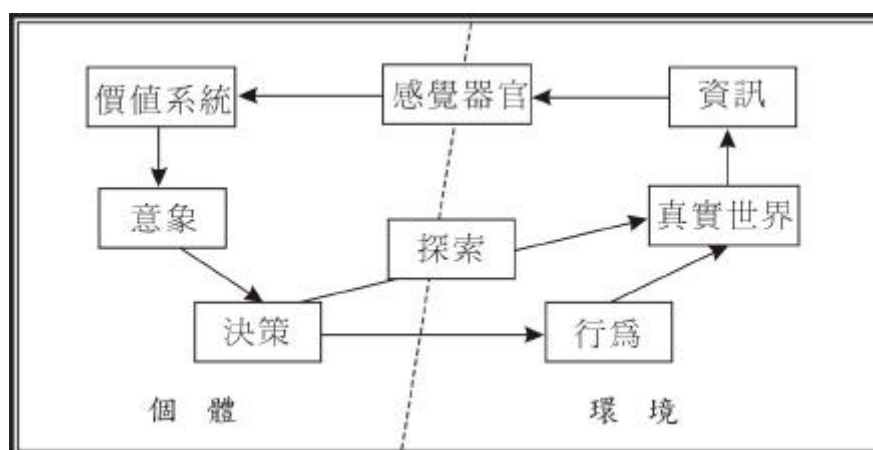


圖 1-2 地理空間識覺的觀念架構

資料來源：R.M.Downs (1970):p85

成為意象²⁷。Downs 雖然將以往學者所研究的各個概念予以明確的關係化，但在意象的形成過程上，並無深入著墨，實為可惜。

Downs 的識覺概念架構提出後，成為眾多地理學者所遵奉之圭臬。然誠如其本人所言，該架構乃簡化形式，且並非為一操作性的研究典範。(Downs,1970：84)有鑑於此，Gold(1980)隨後提出一個較複雜的個體空間認知與行為之研究架構圖²⁸。然而在該架構中，卻無標示外在真實世界的刺激和過去行為經驗的影響，據此，Golledge 和 Stimson(1987)進一步修改 Gold 的架構，並融入 Burnett(1976)的意見，建構出一個極為經典的操作性研究典範(見圖 1-3)。在此架構中，我們關注的是由外在世界到心智模式內部的運作過程~即黑箱的內部運作機制。特別是意象的形成，除了受外在世界環境的刺激外，亦受到個人變數(個性、動機和情緒)與團體和文化因子(包括社會、政治系統與制度)所過濾，當然，過去的行為(經驗、學習和態度)亦扮演著極為重要的決定性角色。

²⁶ Downs,R.M.(1970), " Geographic space perception:Past Approaches and Future Prospects," Progress in Geography,2:65-108.

²⁷ 其他要素的說明補充如右：意象為為個體行為決策的依據。其形成後，若個體認為資訊不夠完整，將回到真實世界尋求更多資訊而重複另一過程，直到滿意或受某些條件限制後而停止搜尋。而後個體再以此意象作為是否對真實世界展開行動的根據。若有決策行為的出現，則將進一步改變真實世界。而改變後的真實世界將為人類提供更新的資訊而被接收，整個過程又再進行另一次的循環。(Downs，1970:84~85)

²⁸ 可參閱 Gold,J.R(1980),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ural Geography,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P42

P.Rodaway(1994)²⁹ 曾將影響人類識覺的文化因素特別提出來討論。他認為，影響人類識覺環境之因素雖多，但截至目前，過去學習的行為仍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識覺的敏銳度是經由學習而得，且由此形成人類社會化並得以使其成為一文化群體。此即為人類識覺的文化因素。為具體說明此因素，Rodaway 修改 Jeans(1974)所提出之人類識覺文化因素模式，將此模式中人與環境的介面~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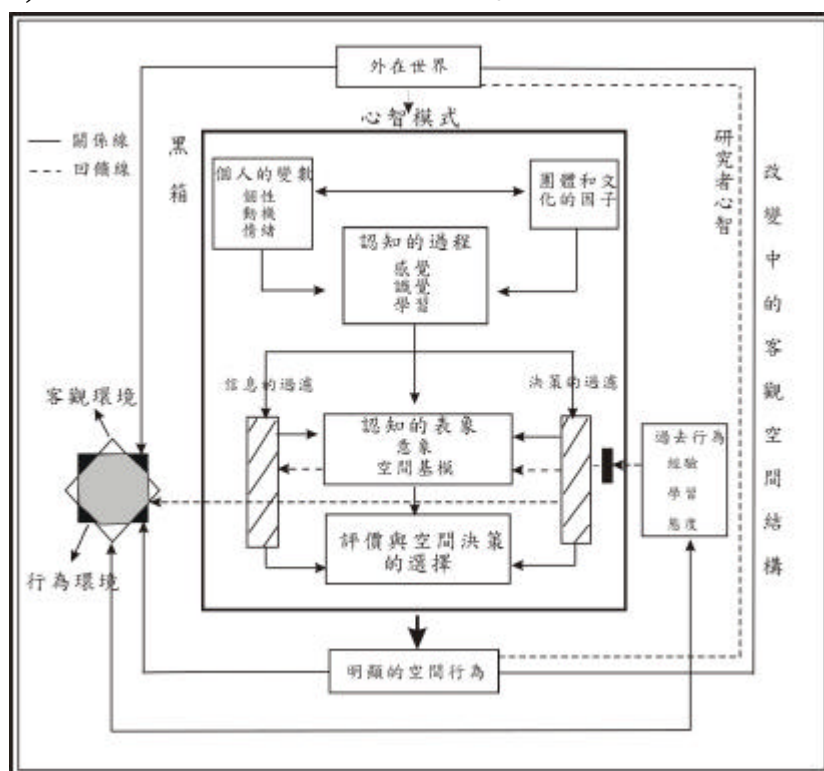


圖 1-3 個體空間認知和明顯空間行為之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Golledge and Stimson(1987):p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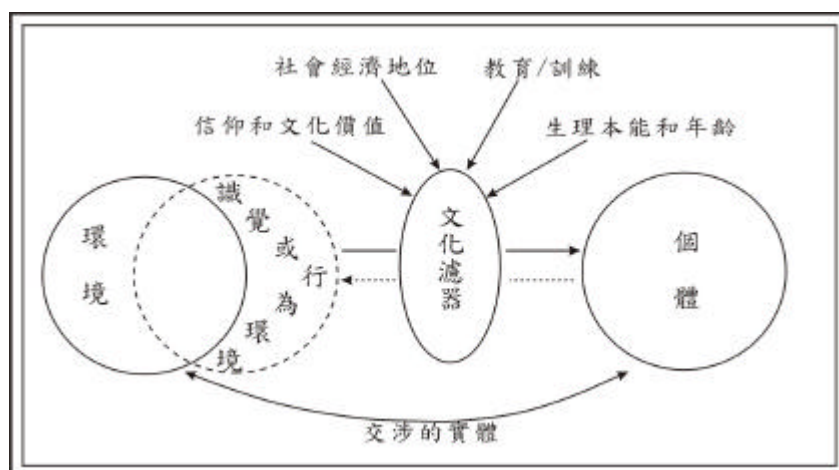


圖 1-4 人類識覺的文化濾器

資料來源：Rodaway(1994):p23

²⁹ Paul Rodaway(1994) , Sensuous Geographies,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濾器，予以進一步界定明確之文化要素，包含文化群體共享的價值和信仰、教育和訓練、社會經濟地位或階層，和生理本能及年齡(見圖 1-4)。易言之，人類對外在世界的識覺意象，乃是以前述各文化要素為媒介所過濾而成。

(2) 意象形成之環境分類

為簡化人類對其環境識覺之界定問題，許多地理學者將焦點置於直接影響到個體的重要環境範圍。在地理學界中，首先將識覺環境分出而成為一個明確的地理環境區者，即是 W.Kirk。(Brookfield,1969:57)Kirk(1963)指出，地理學者的基本責任是要研究存在於地理環境的一致性範疇中所產生的問題。在此範疇中，真正的二分法並非是傳統的人和環境，而是現象環境(Phenomenal Environment)和行為環境(Behavioural Environment)。所謂的現象環境，不僅包含自然環境，亦涵括人類所創造、改變的環境。一般人皆與此環境直接接觸。但當該環境透過人類的動機、偏好、思考模式以及源自於其社會和文化傳統而被識覺時，則人類所接觸的環境將深入至所謂的行為環境。在不同文化族群中或於一特定文化之不同歷史階段裡，相同的經驗資料將被安排成不同類型，並且得到相異的意義。因此，透過行為環境，現象事實被安排成為類型和結構，並且在文化影響支配下獲得價值。(Kirk,1963:364~367)故，行為環境即為人類所識覺的環境，於此形成人類對環境的心智意象，且人類行為與決策的產生皆由此而來。

爾後，H.Sprout 和 M.Sprout(1965)亦提出與 Kirk 類似的觀點。其將環境區分為實際環境和個體所識覺、反應的環境。Sprout 夫婦特將後者稱之為心理環境(Psycho-milieu)。個人的心理環境並非由外在於個體的現象所構成，而是由兩項要素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意象和概念所組成的。此兩項要素包括：個人經由其感官選擇性的接受來自環境之訊息，以及個人的價值、意識性的記憶和潛意識經驗的架構。(Sprout,1965:28)由以上說明不難發現，Sprout 夫婦的心理環境近似於 Kirk 的行為環境。

Sonnenfeld(1968)更將人類環境依行為與其關係程度，分成四個內疊可區別的環境(如右圖 1-5)：

- ①地理環境(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涵括範圍最廣的環境，乃是客觀環境。
- ②運作環境(the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地理環境中影響並與個人或群體產生關係的環境，該環境亦為人文地理學者所研究的環境。
- ③識覺環境(the Perceptual Environment)：
運作環境中，經由人類感覺器官或學習和經驗所知覺的環境。
- ④行為環境(the Behavioral Environment)：
人類所察覺並對其引起行為反應的那部份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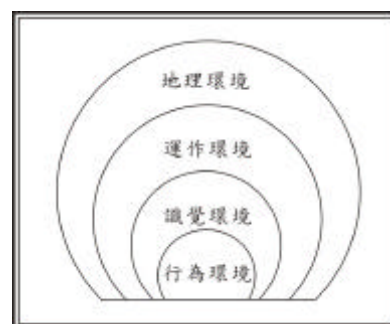


圖 1-5 環境的行為分類

資料來源：Sonnenfeld, j " Geography, Perception, and the Behavioral Environment, " in English, P.W. and R.C. Mayfield, eds., Man, Space, and Environment, P246

在 Sonnenfeld 所劃分的四種環境中，識覺環境類似於 Kirk 的行為環境和 Sprout 的心理環境，皆為意象形成之直接來源。另外須注意的是，Sonnenfeld 提出的行為環境，涵蓋範圍應較前兩者狹小。

(3)本文研究概念

由前述地理學者之研究成果，本文整理出以下將運用之概念：

①意象形成方面：

Golledge and Stimson(1987)的研究架構堪稱最完整、最精緻，並同時整合行為地理學的兩大內涵~環境識覺和空間行為。惟本研究置焦於環境識覺，故僅參考此架構中關於意象形成之部分。另外，在該架構中，影響個體識覺過程之團體和文化因子並無列出特定要素，因此本文乃以 Rodaway(1994)提出之文化濾器各具體要素及 Golledge and Stimson(1987)在其著作中所提及之政治系統因素，作為團體和文化因子之參考要項。此外，本文在該架構中之識覺過程，加入了 Wright(1947)和 Lowenthal(1961)所闡發的想像。Wright 認為即使世上已無未探險之大陸，地理學家仍可探求人類心智中未知的領域，(Gold,1980:35)於此領域中，想像不僅為我們提示了一些路徑以供遵循，更利用我們所發現之事物形成與他人共享之想像概念。(Wright,1947:4)據此，想像並非憑空幻想，其不僅是人類識覺環境的種種過程之一，更是以族群文化為立足根基，故本文亦將此要項置於研究概念中。

②意象形成之環境分類方面

Sonnenfeld(1968)的環境行為分類，與 Kirk 和 Sprout 相較，可算是較精確的。在其所劃分的四種環境中，涵蓋範圍最廣的地理環境，不僅包括直接和間接影響個人或群體的環境，亦涵括對個人或群體無影響的環境。前者即由地理環境中再細分的運作環境。在本研究中，該環境可視為是直接影響馬祖地區閩東民系的生活環境，亦即，馬祖地區各島為早期閩東先民進行識覺之環境訊息來源。

作為一客觀環境之運作環境，為個體提供環境訊息，此環境訊息經由個體感官和個人、團體文化因子之過濾，再與過去經驗進行組織結構，將使個體進入所謂的識覺環境。然須注意的是，Sonnenfeld 所提及之識覺環境包含兩種環境：知覺環境(Sensory environment)和象徵環境(Symbolic environment)。所謂知覺環境，涵括刺激個體的多種能量，如氣溫、溼度、聲音、亮度等，雖然每一個體對於該類刺激的知覺可能不盡相同，但一般而言，其仍屬於客觀而可度量的環境。而象徵環境中，個體所受之刺激，可能或非來自於環境上。地理環境提供予以象徵環境之聚焦點，僅有某些景觀意象，且該類景觀意象只是一種信號或提示，並非象徵意義的來源，它需經由人類的文化、個性之轉化，才能得到意義。(sonnenfeld, 1972: 248~249)易言之，象徵環境之知覺並非來自環境，主要來自個體。因此，我們可下一個定義，即知覺環境的識覺來自於外在環境，而象徵環境的識覺來自於個體本身，此種概念將於研究中加以運用。

行為環境在 Sonnenfeld 的分類中，範圍最小。該環境主要是人類所察覺並對其引起行為反應的那一部份環境，由於本文不涉及空間行為，在此不予探討。

2.研究指標~地名

地名的結構，主要由通名和專名兩部分組成。所謂通名，係人類在地表環境上所指辨之地理實體的地理性質，具有「指類」的特徵，而專名，則是人類以特定方位、範圍或形態區別各類地理實體，具有「指位」的特性。(景兆璽，1993：41~42；王際桐，1999：13~14)就本研究在馬祖地區進行田野調查的結果，該地地名景觀中，其結構僅有專名而無通名者為數頗眾，而此種地名結構雖屬非正式地名，但因其皆為人類所言說創造而成，在一定地理實體範圍內具有唯一指稱之代表性，本文亦將此類地名納入探究。

3.地名與環境識覺的連結

作為環境意象代表之地名，將如何與前述環境識覺概念連結？美國地名學者 W. Zelinsky (1976)³⁰曾針對該國之墓地名稱分析美國人對來世的觀念。其由墓地名通名部之探究，反映出美國人對墓地景觀之偏好，由早期單調、純粹之墓地，到後來漸視其為具有回憶懷舊性質的公園綠地；而在專名部之解析上，更勾勒出美國人對來世純粹視覺感官的想像景觀~不僅山水環繞可盡情鳥瞰遠景，且其更由早期封閉性質的林地景觀，到後來漸演變為較具開放性質的草地、具東西方向性及由玫瑰點綴而成之來生世界。Zelinsky 對通名、專名之個別分析探究，揭示了兩者在文化景觀上具有互異之象徵意義，此亦提供本文一條思考脈絡：地名結構之通名、專名在環境識覺上各代表的意義為何？兩者又能與環境識覺概念作何種連結？本研究下文將再深入說明，作為分析馬祖地區環境意象之基礎架構。

(1)通名與識覺環境的對應

西方學者 Kevin Lynch 在城市意象的實證研究上，曾提出城市意象具有一視覺特性：「Legibility」，即「可識別性」，透過它能使人類輕易辨識城市景觀，並予以組織成具條理性質之型態。Lynch 並利用此觀念，將城市意象歸類為五項視覺元素：路徑、節點、邊緣、地區和地標。(Lynch，1993：2~3、46)然而，此五項視覺元素，雖或多或少涵括自然環境，但畢竟，其仍舊以人為創造之城市環境為識覺資訊主要來源，不盡然能適用於在國軍未進駐前，少有人力大量介入之馬祖島嶼識覺空間。言雖如此，Lynch 所提出之概念猶有本文可借鏡之處，即 Legibility，應非僅適用於城市空間背景，基本上地表任何環境，無論自然或人文，人類皆能透過視覺加以辨別、歸類，而此種特性，正與地名結構中用來指辨各類地理實體環境的「通名」是一致的，亦即，Lynch 藉由 Legibility 將城市意象歸類為五種視覺環境元素，而當人類以 Legibility 放諸於各島嶼與其內部之空間尺度上，則各群體所能識覺並加以歸類的環境元素，則相當於地名通名所界定的地理實體環境類別。因此，藉由通名的分類剖析，可落實各群體在識覺馬祖地區整個客觀運作環境中，經由感官，特別是視覺，與學習經驗過濾而成的各類環境元素，而該類環境元素的集合，即可與西方地理學者 Sonnenfeld (1968) 所界定之識

³⁰ Wilbur Zelinsky (1976), *Unearthly Delights: Cemetery Names and the map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Afterworld*, In *Geographies of the Mind*, ed. David Lowenthal and Martyn J. Bowden, 171-19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覺環境相對應。

(2)專名與深入知覺環境、象徵環境中的意象特徵

在以通名作為各群體的基礎客觀識覺環境中，各群體所形成之環境意象，主為緣於環境的客觀實體？抑或來自於識覺群體主觀的認知？地名中作為區別互異地理實體的「專名」，或可作為媒介加以審視。

專名所代表之意象分析，除了先以感官知覺為切入點外，在此基石上，各群體經由感官接收的環境資訊將再透過兩種主要方式被組織，其一，為緣於客觀環境的轉化，其二，為緣於主觀個體的轉化，前者即 Sonnenfeld 在識覺環境之下所細分的知覺環境，後者則為識覺環境中與知覺環境相對的另一部分~象徵環境。然而，該種純粹的客觀、主觀二分法，將使主觀(subjectivity)陷入成為與客觀(objectivity)相對、而具錯誤、虛構、有意的誤解。事實上，依 Wright 的觀點，主觀不僅與個體自身相關，同時亦可能具有真實性的象徵意義，因此，Wright 又將主觀再細分為兩類：虛幻的主觀(illusory subjectivity)、真實(realistic)或客觀(objective)的主觀，此二者，將在與地理相關、且具重要性之三種想像過程~直覺、促進、審美，分別佔有一席之地。所謂直覺想像(intuitive imagining)，目的主要是獲得真實的概念。促進想像(promotional imagining)，主要由個體的想望去促進或支持其私慾或目標，而非尋求客觀的事實。而審美想像(aesthetic imagining)，僅是促進想像的支脈之一，於其中，促進個人私慾主要是由享受想像過程、或藉由交流藝術作品而給予他人滿足的想望所支配。而此三種想像與前述二種主觀之間的連結關係是：客觀的主觀雖主要支配著直覺想像，但亦於某種程度影響著促進想像，然即若如此，帶有個人想望之促進想像及審美想像，仍由虛幻的主觀所主導。(Wright, 1947: 5~6)

綜上所述，本文在專名的分析架構中，以知覺環境、象徵環境為各群體識覺過程所能深入的兩種主要環境類型，前者孕育了客觀的環境意象，後者釀就了主觀的想像意象。而想像意象又依主觀的深淺程度可區分為以促進想像過程(含審美想像)為主的虛幻想像意象、及以直覺想像過程為主的客觀想像意象。其中，與環境連結較深的客觀想像意象，又因識覺主體在組織意象過程中，文化價值因素介入的深淺而有不同的意象屬性，本文另將需文化信仰價值過濾所得之意象，名為文化想像意象。

(3)本文分析架構

透過上述說明與前述環境識覺文獻所整理之研究概念，本文建構出地名與環境識覺之整合分析架構，如圖 1-6。在此分析架構中，著重焦點除與中外地名學者之研究方法相同，針對不同命名系統之地名景觀，將其所屬通名、專名予以分類歸納，進而剖析各群體之識覺環境與意象屬性外，並經由該類特徵釐清各群體之識覺濾器特性、與外在環境資訊所扮演的角色。

4.研究資料來源

地名學為一跨多學科之綜合研究，其地名起源之探討，除須運用地理學相關方法外，另涉及到歷史學、語言學之知識，故本文運用之資料來源主要如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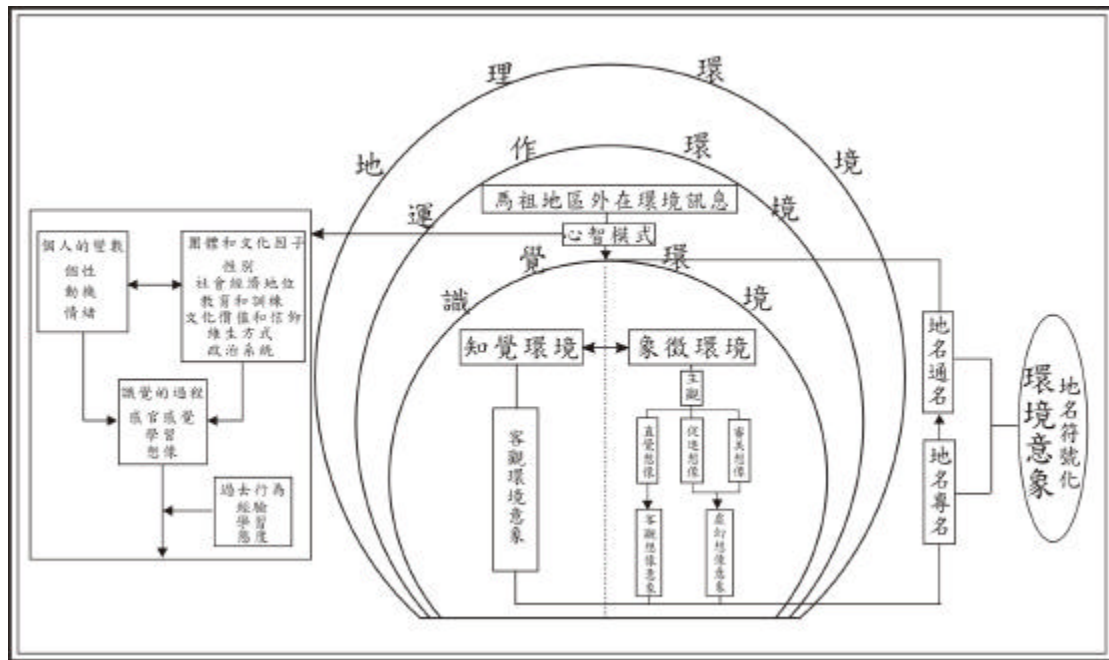


圖 1-6 地名與環境識覺之整合分析架構圖

(1)史料、報刊與地圖：作為一種文化景觀，地名，非僅為其表徵意涵，它是經由人類口語言說隨時間醞釀逐漸成形，此種口語言說，將直接彰顯某段時間尺度內該識覺主體者之環境意象獨特性。因此，在著手於地名研究時，必須針對地名之時間演替、空間範疇與其由來加以考證、釋義，才能釐清各群體所屬之命名及其特性。本區最早由馬祖先民所創造之地名，雖已無法完全透過田野調查探求其時間起源與由來，但鑒於文件中的地名往往被賦予其實際價值，故藉由蒐集最早出現於文件或地圖之地名書寫證據，不失為一較具可信度之考據方法³¹，此類資料，包括宋、明、清至民國以來各代地方志與相關史料輿圖典籍。而西人所創造之地名景觀，除主要參閱自《海道圖說》、《中國江海險要圖誌》，並配合日本水路部參考英海軍原圖所繪製之《中國沿海港灣島嶼圖》402 閩江附近 作為考證依據。此外，軍管時期國軍所創造之地名景觀，因駐守國軍流動頻繁，加以無建立完善之資料存檔，部分地名實難考查，本研究主要以民國四十六年創刊之《馬祖日報》與聯勤所繪製之《連江縣行政區圖》作為地名資料之蒐集來源。

(2)田野調查：除前述史料蒐集、考證之歷史方法的運用外，由於研究區內小地名乃由住民使用其母語命名者，因而有藉其原始發音~福州方言讀音，了解其涵義之必要。再者，地名與地理環境之關係極為密切，(陳國章，1995:增訂版序)為決定地貌之自然特性，地形圖判讀、現場親眼觀察或住民之口語描述，皆可作為其憑藉依據³²。此兩種語言學、地理學之考證方法，則必須透過田野調查、訪談才可運用。在田調實施範圍上，馬祖地區島礁雖不少，但先民生活場域向以大島為主，惟部份島嶼，如高登、大坵、亮島等，早期或有先民久居或暫時搭寮

³¹引自網站：<http://gis221.sinica.edu.tw/document/加拿大地名田野調查工作手冊.pdf>

³²同註 31

掛網，但國軍進駐後由於百姓陸續遷移已成為國軍駐守島而無法將之納入探究。因此，本文之田野調查，主要針對四鄉內南竿等六大島(參閱第二章馬祖地區的環境背景)進行。調查時間有二階段：第一次為 2004 年 7~9 月，第二次係補第一次之不足，時間為 2005 年 5/10~5/20。訪談對象，以各村內具有受教背景且具捕魚或貝類採集生活經驗之耆老或相關人士為主，主要受訪對象羅列如下表：

表 1-1 地名田野調查主要受訪對象

鄉別	村別	主要受訪對象
南竿鄉	復興村	陳聯玉(72)、陳高旺(71)、曹佬福(65)
	介壽村	陳依茂(82)、陳豐年(76)
	福澳村	林春仁(65)、林宜水、林宜發、林宜寶、林建亞、林其達(57)
	清水村	林金和(82)、陳善華、陳善清
	珠螺村	黃福平(71)
	仁愛村	劉永端(76)、陳其灶(67)
	津沙村	陳仁灼(62)
	馬祖村	林健民(72)、董金貴(55)
	四維村	劉治國(65)、曹嫩嫩(73)
北竿鄉	塘岐村	周秋弟(75)
	後澳村	陳兆福(74)、王侏弟
	橋仔村	黃炎炎(72)、陳雄飛(55)
	芹壁村	王顯同(91)、陳則浩(82)、陳天歲
	筐廬	王美淦(60)
	白沙村	劉禮泉(68)
莒光鄉	福正村	鄭城官(76)、曹祥安
	大坪村	陳全妹
	青帆村	陳梅官(75)、陳長存
	田澳村	林玉寶(82)
	西坵村	陳火金、陳金妹(62)
東引鄉	中柳村	陳瑞琛(87)、陳寶珠(68)、林其惠(65)
	樂華村	

5.研究目的

由上述研究概念、研究指標...等各研究方法項目之釐清，本文冀望達成以下三項目的：

- (一) 普查馬祖地區四鄉全境各島礁之地名概況。
- (二) 考證馬祖地區四鄉全境地名並加以釋義。
- (三) 將馬祖地區四鄉全境地名，依其命名系統(即識覺主體)劃分為三大類項，據此再將每一類項之地名進行分類，以分析馬祖地區三大命名系統創造之地名所展現之識覺環境、意象特徵及其識覺意涵。